

文章编号: 1003-2398 (2004) 05-0022-04

马可·波罗东游与长春真人西游^{*}

——旅游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差异性研究的典型个案

李小波^{1, 2}, 袁霜凌²

(1.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 成都 610064; 2.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6)

MARCO POLO'S TRAVEL TO EAST AND CHANGCHUN TAOIST'S TRAVEL TO WEST

——A Case study on Behavior Geography and the Thinking Mode

LI Xiao-bo^{1, 2}, YUAN Shuang-lin²

(1. Urban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As travel notes can convey the traveler's thoughts, we regard it as a 'map' that can reflect people's perception in their minds. When we come to study the travel notes, the subject's differences of behavior geography can never be ignored. The essentially symbolic factors of cultural geography background are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stom, of which th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ones are the religion and custom. But, in the book "The Travel notes of Marco Polo", we find that nothing about those landscapes was mentioned. The reasons for that are: As a western foreigner, he hardly can understand Chinese people's cultural feeling thoroughly; as a businessman, he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rket, money and women. Travelers' motivation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mselves. Their observation and selection of everything around them usually depend on their own choices. Besides Marco Polo's cultural background in which he grew up, in the author's opinion, he received Mongol nationality's culture tradition for emperor's trust since he arrived in China. A lot of people traveled among Asia, Europe and Africa due to the reasons of politics, religion and personal interest. They left a large quantity of written materials.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traveler's behavior and geographic vision within two most typical travels in that special period: "The Travel notes of Marco Polo" and "The Journey to West of Chang Chun Taoist". Considering their culture and geography background, one is Christian, while the other is Taoist.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was based on a thinking experiences while Qiu Chuji, a Taoist leader, saw everything throughout the journey from an Taoist's angle; Regarding the motive of traveling, each had his own purpose in business or political preach, Marco Polo focused on products, market and trade while Qiu Chuji emphasized on the religion purpose and the political purpose; In respect of custom, one was seeking to pursue novelty while another tried to appreciate the nature and life. Through this typical case, the essay also puts forward three inspirations about the research into ancient Chinese travels: different space perceptions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different space percep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Key words: Marco Polo's Travel notes; Journey to West Of ChangChun Taoist; Behavior Geography

^{*} 收稿日期: 2003-01-29; 修订日期: 2004-03-19

作者简介: 李小波 (1965—), 男, 重庆市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方面研究, 已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提 要: 游记是旅游者思想的载体, 是旅游者自身的“感知地图”。在游记研究中, 决不能忽略主体的行为地理差异。元代是东西方交通非常繁盛的时期, 不少人由于政治、宗教、贸易和个人志趣等原因往来于亚洲、欧洲、非洲之间, 流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 本文通过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部游记(《马可·波罗行记》和《长春真人西游记》), 分析了当时旅行者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的差异性。从文化地理背景看,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是道教徒; 从旅游动机看, 有商业利益和政治传道的不同目的, 在风俗感受方面, 一个是猎奇, 一个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本文还通过这一典型案例, 提出中国古代游记研究的三点启示: 即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视角,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视野, 群体与个人行为的共性与个性。

关键词: 马克·波罗游记; 长春真人西游记; 行为地理

中图分类号: K919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提出: 马可·波罗缘何“有眼不识泰山”

游记是旅游者思想的载体, 是旅游者自身的“感知地图”。在游记研究中, 决不能忽略主体的行为地理差异。在元代游记研究中, 唐晓峰教授曾提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命题——“马可·波罗缘何不见黄河泰山?”^[1], 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 黄河、泰山是何等神圣的文化意象, 然而《马可·波罗游记》中, 居然只字未提, 就其原因: 马可·波罗作为西方人, 他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情结, 作为商人, 他眼中全是市场、金钱和女人^[1]。笔者认为, 除了个人成长的文化背景外, 马可·波罗来中国后, 受到忽必烈的信任, 主要接受了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有眼不识泰山”的原因之一。本文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进行对比, 去分析不同行为特征下地理视野的差异, 并通过这一典型个案, 力图给古代游记研究以有益启示。

2 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的差异

2.1 文化背景差异: 基督徒与道教徒

文化地理背景的标志性要素是语言、宗教和风俗, 反映在游记内容中的主要是后两者。马可·波罗描述各地时, 总是放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中, 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基督信徒的心路历程。比如: 他认为大阿美尼亚区域(大约在高加索、里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境内高山就是诺亚方舟避洪水的遗存之处。论述报达城(今巴格达)及其陷落时, 专门用四个章节讲述了基督信徒和报达城回教徒哈里发的矛盾冲突, 最后基督徒用上帝之灵, 祈祷移动山体, 战胜对手并留下“灵迹”, 似乎报达城的毁灭早在基督预言之中。这种“灵迹”还发生在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中部

城市), 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皈依基督教(其实是成吉思汗及后人优待基督徒, 非皈依), 在城中建教堂时用了回教徒的一根精美石柱, 察合台死后, 回教徒试图用武力收回石柱, 结果在耶稣庇佑下, 石柱虽去但建筑悬空不坠。东行途中, 只要有基督教分布, 马可·波罗必记之。对于其他宗教, 则一笔带过。

马可·波罗的宗教感情不仅仅停留在记述上, 由于受到忽必烈的信任, 他在欧洲教皇与东方大汗之间充当了政治使者。欧洲教皇希望鞑靼人与回教徒相互牵制, 马可·波罗建议忽必烈联合欧洲, 讨伐回教民族, 对鞑靼人与回教徒的长期战争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马可·波罗还重点叙述了成吉思汗在基督教占星者的法术下, 征战获胜的“故事”, 成吉思汗“由是厚礼基督教徒, 视其为能言真理之人”^[2]。

邱处机身为全真教首领, 以道教眼光看待沿途一切。西行途中频繁举办宗教仪式, 设坛传道。邱处机出发日选择在1220年正月十五上元节三天醮事完毕后, 山东济南教徒附会说当天万千白鹤起舞, 十分吉祥。每至一处, 教徒们虔诚相迎, 泪眼惜别, 举行法式时, 或久旱逢雨, 或祥云高照, 甚至可以使风沙骤停, 苦水变甜, 就连居庸关剪径山林的强盗, 也叩首避让, 连呼“不要惊动大师”。过准葛尔盆地白骨甸(博尔腾戈壁滩)时,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古战场鬼魂的惊吓, 邱处机坦言“邪精妖鬼, 逢正人远避, 道家何忧此事”。总之, 在李志常笔下, 邱处机是至善至神的“真人”, 一路上仙风道骨, 逢凶化吉, 成吉思汗见面后也称邱处机为“真人”并口谕“从今以后, 可称神仙”^[3]。

不同宗教信仰在游记中表现出来的宗教认知明显不同, 对同一地点的不同描述最能看出差异。两人都游历过撒麻耳干, 马可·波罗大肆渲染鞑靼人占领该回教城市, 同时基督教显现“灵迹”, 代表了当时基督教社会对东方两大政治势力的强烈关注。在邱处机眼中, 蒙古人占领撒麻耳干后, 回教徒由田园之主变为契丹人、西夏人、色目人、汉人的附庸, 民族矛盾引起社会动荡, 邱处机在城中为将领耶律阿海斋醮祈福, 同时观星看月(正好不久前出现过日食), 感叹天地人生, 即兴赋诗:“日月循环无定止, 春去秋来, 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 一兴一废长如此。死去生来生复死, 轮回变化何时已。不到无心休歇地, 不能清净超于彼”^[4]。

2.2 旅行动机差异: 商业利益与政治“传道”

旅行动机对游记内容至关重要, 旅行者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取舍往往是一系列自觉的选择, 马可·波罗的商人眼光与邱处机的传道精神形成了游记的主要风格, 前者主要关注物产、商道和市场, 后者是宗教目的和政治目的的结合。

各地物产是马可·波罗的首选内容, 尤其关注欧洲市场所需产品, 如宝石、金银(就连男女身上的金银饰品都尽在眼中)、香料、丝绸、地毯等, 通过各地物产市场的描述, 马可·波罗利用丰富的游历(从西来朝觐大汗, 到任职巡游, 最后归国), 在游记中勾勒出元代重要的道路和商业

城镇。①古丝绸之路：从中亚地区的亚美尼亚、巴格达、忽鲁模思（今伊朗霍尔木兹附近）、撒麻耳干，到新疆可失哈耳、鸭儿看，沿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和田、于田至罗布泊、哈密，穿过河西走廊沙洲、肃州、甘州。②元朝统一后，鼓励商人到草原贸易，原来由于政治军事目的建立的城邑逐步成为商业重镇，比如亦集乃城、和林城（窝阔台建都于此）、上都（忽必烈都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集宁等。③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沿线的城镇成为商贾云集，万方辐凑之地。④元代海上贸易频繁，商港众多，马可·波罗回国时取道海洋，对中国沿海和日本、越南、印度等港口均有记载。尤其对于重要的商业都会，更是浓彩重笔。比如对元大都城市宏伟、宫殿精美、商业繁盛、货币流通、庆典隆重等感叹不已，认为“世上从未有如此强大之君主”^[5]。泉州是当时最大海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6]。运河畔的杭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商税甚巨，仅闻其说而未见其事者绝不信之”^[7]。邱处机西游是奉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传道。当时天下三分（元、金、宋），纷争不息，成吉思汗希望笼络道教势力，为以后统治汉族作好准备，同时，自己也是壮士暮年，对道教长寿之道、养生之道发生兴趣。两人初次见面，成吉思汗便问有何长生不老之药供他享用。邱处机十分清楚此行的目的，在传道同时劝戒大汗怀安天下，恤民保众，正如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8]在这种背景下，游记内容集中在宗教习俗（本文前已表述）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状况，对经济贸易状况不甚关心。

邱处机论道是游记的核心之一，但遵照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的禁令，李志常未记入游记。作为军中绝密材料，后被耶律楚材整理，编成《玄庆风云录》，基本内容一言概之，就是在道教理论和中原文化体系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邱处机希望成吉思汗走道家修真之道，行善造福，逐渐达到美好境界。“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人以饮食为本，其清者为其精气，浊者为之便溺。贪欲好色，则丧精耗气，乃成衰惫。陛下宜珍蓄一宵一为，已为深损，而况恣欲乎！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邱处机还大力宣扬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成吉思汗十分欣赏，“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9]。邱处机西游可谓“满载而归”，达到预期目的，名声更望，还得到了免税的特谕，在晚年将全真教推向鼎盛。

2.3 风俗感受差异：猎奇与感悟

风俗特征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上层官僚社会的教化，二是民间民众的习染，所谓“鼓舞于上者谓风，习染于下者为俗”。由于东西方大地域差异的缘故，马可·波罗游记中风俗猎奇内容要比长春真人西游记全面生动得多，体现了各阶层、各区域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差异性。

由于马可·波罗特殊的身份，颇受忽必烈的信任，他对蒙古帝国宫廷内部颇为了解，折服于蒙古帝国的强大，认为“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徒和回教帝王联合，其力及其事业亦不及忽必烈汗之大”，对展示游牧民族剽悍之举的皇家行猎尤感兴趣，对行猎日期、狩猎物种、捕猎狮豹山猫犬鹰的蒙养、出猎队列、猎场管理、捕猎过程以及行猎后的大朝会，十分详尽。他最好奇和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汗葬俗，君主及一切后裔皆葬于阿勒台山中，送葬途中，见人辄杀，记载蒙哥汗死时，道杀两万有余。

蒙古神道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状况，主要信仰保护子女、牲畜、麦田的地神，每家制作神像和神妻、神子之像，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表明地神已受礼敬。蒙古民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随地域变迁，自弃信仰而融入当地风俗，比如在中国成为佛教徒，在波斯成为回教徒等。马可·波罗观察到这一特点后，十分希望蒙古皇室能皈依基督。他认为忽必烈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和佛教均以荣誉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良之教之意”，所以，“教皇若派遣可能宣传吾辈宗教之人，大汗必已为基督教徒”，可谓用心良苦^[10]。

对于民间风俗，从饮食习俗、居住方式、婚丧嫁娶等各方面都有记载，其中对奇特的性风俗和婚俗关注较多，每到一处，非常注意女性容貌形态及行为。比如哈密州有妻子伺候过往客人的习俗，丈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蒙哥汗曾严令禁之，但居民强烈要求保留祖宗遗风，蒙哥只得放任，保存此“恶俗”。马可·波罗在元朝任职期间，奉命巡使到西藏、云南、四川边界，记载当地少数民族女性与外来客人随意同居，居民反觉“可贵，甚喜”，这实际上是封闭地区民族为求取生存，希望种族繁衍同时避免族内近亲繁殖的办法，此风俗有的地方至今尚存。

相比之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风俗记载不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原和蒙古地域接近，加之汉唐以来民族交流频繁，相互了解较多，特别奇异的风俗不多。另外，邱处机主要关注宗教礼仪，而且总以“中原”的文化优势去审视边疆。比如在库仑（今乌兰巴托），他发现当地蒙古族奇特的穿戴后，立即以诗记其实：“茹毛饮血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11]。在撒麻耳干，居民不仅容貌装束奇特（男女编发，头饰斑斓，有妇女长着茸茸胡须等），而且举行一种非佛非道的“告天”仪式，邱处机感叹“遐荒鄙俗难论道，静石幽岩且看书”。但是，在天山吐鲁番附近小城中，在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信徒陪同下观看伎乐时，得知当地风俗有大唐遗风，尽管当晚风雨飘零，他仍动情赋诗“万里征途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短篷飘”^[12]。甚至汉人见到邱处机时，欢呼“用汉人礼节，用汉人礼节”。所以，邱处机以道教首领身份，感悟天地人间，世事沧桑，同时内心深藏中原文化的优越感，在这种心态下记述的风俗，与马可·波罗的猎奇内容自然大相径庭。

3 研究启示

游记研究中, 分析个人行为特征与地理视野的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之所以以元代的两部游记为中心, 是因为在元代东西方交流的大地理背景下, 东西方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差异性最大, 而且马可·波罗与长春真人作为基督徒和道教徒, 以不同的目的, 相向通过同一个区域, 是最具典型性意义的实证研究个案。透过这一个案, 结合行为地理学理论, 可给中国古代游记研究提供以下启示。

3.1 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视角

行为地理学是对空间科学方法的修正, 使之向一个更积极、更行为化的空间科学发展。本文对马可·波罗与长春真人的比较研究, 充分说明了同一历史时期,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旅游动机的旅游者所展示的不同地理视野。

此外, 旅游者描述手法的差异也要引起足够重视, 要把诗词歌赋中的“咏记”、地方志记载的“志记”与“游记”结合起来。“咏记”采用文学描述语言, 非理性成分较多, 但是所揭示的现象值得注意, “志记”中的记载往往为政治、经济的需要服务, 难免偏颇, “游记”中的个人情感也会导致“失真”, 只有三者对比, 相互参照, 方可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3.2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地理视野

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地理背景, 导致有不同的游记类型。游记反映了历史时期地理状况的演变, 也反映了古代地理学思想的阶段性特征。西方行为地理学十分重视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他们认为: “历史地理学家研究三个世界, 由文献和景观记录的真实世界、由过去一般空间模式描绘的抽象世界和认知环境。重建过去的环境是极为困难的, 因为涉及到用作者的眼光去看待文献资料。所以, 对过去行为环境的研究是解释景观变化原因的关键。在弄懂景观以前, 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 必须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 知道他周围的人给他怎样的规矩让他遵照执行不得违反”^[13]。中国的游记充分体现了历史背景下行为特征和地理视野的差异。神话性游记体现了人们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对外面世界的“心游”历程; 宗教性游记是佛道信徒用虔诚心灵去感悟山水之情; 政治性游记是个人抱负和国家权力的扩张; 科学游记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旅游者科学精神的体现。所以, 研究中需重视时间剖面上纵向对比。

3.3 群体影响与个人行为

西方行为地理学强调从侧重研究集聚人口。转变为侧重研究分散的个人与小团体。一个人的成长必然受到一个

群体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忽略了这一点, 就会夸大个人行为的作用, 出现“无源之水”式的研究结果。比如徐霞客研究, 长期以来, 学界将徐霞客视为科学奇人, 旷世奇才, 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但极少注意到影响他成长的社会群体。邹振鹤教授指出: 徐霞客决不是独立特行的“畸人”, 他是明代后期众多旅行家中的一员, 由于社会变革, 大众化旅游在明代后期蔚为风气, 仅清初黄虞稷编写的《千顷堂书目》, 就记载有明代山水志和游记有 57 部之多, 所以, 徐霞客是由时代造就, 又超越了这个时代, 成为众多旅行家中最杰出的一员^[14]。

[参考文献]

[1] 唐晓峰. 马可·波罗缘何不见黄河泰山[J]. 中国国家地理, 1998, (1): 1—2

[2]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44

[3]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106

[4]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92

[5]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79

[6]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373

[7]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348

[8]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120

[9]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145

[10] 冯承钧译. 马可·波罗行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91

[11]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49

[12] 纪流注译. 侯仁之, 于希贤审校. 长春真人西游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71

[13] [英] R·J·约翰斯顿著, 唐小峰等译.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 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17—218

[14] 邹振鹤. 徐霞客与明代后期的旅行家群体[J]. 徐霞客研究, 1997, (1): 58.